

杜澤遜
主編

國學季刊

顧頡剛題

第二期

山東人

山東大學尼山學堂主辦

詩學季刊

杜澤遜 主編

二零一六年第二期 總第二期

山東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國學季刊. 第二期/杜澤遜主編.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209-09687-4

I. ①國… II. ①杜… III. ①國學—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15998 號

國學季刊 (第二期)

杜澤遜 主編

主管部門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濟南市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電 話 總編室 (0531) 82098914
市場部 (0531) 82098027
網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裝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

規 格 16 開 (169mm × 239mm)
印 張 18
字 數 2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數 1—1000
ISBN 978-7-209-09687-4
定 價 32.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系調換。

《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

(以姓名筆畫爲序)

學術顧問	王國良	白化文	吉常宏	池田知久 (日)	杜維明	
	李學勤	吳哲夫	沈 津	郁賢皓	周振鶴	周勛初
	袁行霈	徐有富	徐 超	陳 洪	崔富章	許嘉璐
	張忠綱	項 楚	黃沛榮	葉國良	程毅中	曾棗莊
	裘錫圭	趙振鐸	趙逵夫	劉永翔	劉曉東	戴 逸
	嚴佐之	羅宗強	饒宗頤			

特邀編委	大木康 (日)	王承略	王雲路	王學典	王 鐸	
	李劍鋒	吳 格	何朝暉	辛德勇	汪少華	胡長青
	高橋智 (日)	郭齊勇	陳 力	陳仕華	陳 來	
	陳尚君	陳尚勝	陳廣宏	孫劍藝	戚良德	張涌泉
	張富祥	黃仕忠	黃愛平	程水金	程章燦	曾振宇
	賈二強	虞萬里	趙生群	廖可斌	鄭煒明	漆永祥
	劉心明	劉玉才	劉宗迪	駱瑞鶴	橋本秀美 (日)	
	顏炳罡					

主 編	杜澤遜
編 輯	孫 齊 李振聚 韓 悅

目 錄

CONTENTS

特 稿

- | | | |
|-----|-----------------------------|---------|
| 001 | 清代山東之學術（一） | 王紹曾先生遺稿 |
| 032 | 《孔子家語》四庫本溯源 | 崔富章 |
| 045 | 《薈要》本《經義考》的序文問題 | 江慶柏 |
| 051 | 由清華簡《蟋蟀》看歷代詩經學的幾處誤讀 | 陳 才 |
| 062 | 《毛傳》《鄭箋》釋“興”類例辨析 | 李才朝 |
| 073 | 《毛詩正義》校讀劄記 | 王靜雅 |
| 078 | 從自然神到災異符號——先秦兩漢虹觀念的變遷 | 馬小菲 |
| 090 | 《經義考》詩類引“劉汲曰”考辨 | 張玉婷 |
| 094 | “吉金”考 | 劉 碩 |
| 101 | 《說文解字》省聲字舉例類說 | 張鴻鳴 |
| 116 | “未沫”“日中見沫”考 | 張曦文 |
| 129 | 宋代喪葬典禮考述（二） | 韓 悅 |
| 150 | 述陳壽祺與翁方綱之爭 | 宋一明 |
| 165 |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大學衍義補》補版時間初探 | 楊勝祥 |
| 171 | 善本經眼錄之朝鮮古活字版拾葉 | 柳向春 |
| 177 | 談《顏氏家訓》明代程伯祥本的刊刻時間 | 白麗萍 |
| 182 | 從《顏氏家訓》看顏之推的經學偏好、治經特色及經學成績 | 鄧子翔 |

- 194 《老子正詁》校議 趙朕瑤
- 211 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 彭 鋒
- 222 “破”與“立”：袁宏道文論中的文學思想初探 閻夢涵
- 234 嚴羽與袁宏道文學思想比較研究 董韋彤
- 245 對民國時期糧食集散市場供銷格局的微觀考察 張怡雯
- 269 一則新的校勘學條例：讀俞樾《羣經平議》稿本劄記 [美] 孟巍隆

國學人物

- 271 陳來先生學術傳略 翟奎鳳
- 279 《國學季刊》稿約

清代山東之學術（一）

王紹曾先生遺稿

先師王紹曾先生，江蘇省江陰縣人，新中國成立初 1952 年來山東濟南工作；1963 年調入山東大學圖書館；1979 年被評為研究館員；1983 年調山東大學古籍所，轉為教授；2003 年 5 月被特聘為博士生導師，時年 93 歲。直到 2007 年去世，先生在山東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工作逾半個世紀，先生嘗謂山東是第二故鄉。基於這樣的原因，先生對山東文獻和山東學術史有特別的興趣，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奉命為“全國古籍善本書目”遴選報送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卡片目錄開始，先後參與了山東省圖書館學會、山東省古籍規劃辦公室的有關學術工作，尤其是參與制訂《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並受山東省古籍規劃辦公室委託主編《山東文獻書目》，對山東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發揮了指導作用，逐步成為山東文獻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在先生主持下，《山東藏書家史略》《漁洋讀書記》《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山左戲曲集成》等有關山東地方文獻整理研究的學術成果陸續完成出版，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可以說，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山東文獻搜集整理和研究以王獻唐先生為代表，二十世紀後半期尤其是二十世紀後二十年的山東文獻整理與研究以王紹曾先生為代表。

先生在山東文獻整理與研究方面的心得，在已出版的幾部專書和論文選集《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中大都已經發表出來，但是對山東學術史的系統論述，先生的用心之作《清代山左學術初探》卻沒有寫完。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先生參加山東省的一次學術會議，做了關於清代山東學術史的學術發言。會後出版社的兩位同志約先生寫一本書，於是先生著手撰寫《清代山左學術初探》。由於先生在“文革”以後承擔了多個學術項目，齊頭並進，這篇文章沒能寫完。這件事先生曾說過，稿子也見過，卻未曾

借來拜讀。今年我計劃辦一份學術刊物《國學季刊》，想到先生這篇遺稿，就請哲嗣王濟康兄找出來複印一份。原稿經過我的博士後王曉靜女士整理，大部分是藍色複寫紙寫件，也有少部分原件。原件是藍圓珠筆書寫的。全稿都是先生親筆謄寫的，字迹較為工整，書法遒勁舒展，不像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手筆。稿子編有頁碼，由於中間修改增補，出現了重碼，現在依照內容理順，重新標上頁碼，共計157頁。原稿用“山東大學科研處稿紙”綠方格紙，每頁300字。中間有四處內容不接，今加括號注“此處未完”“前缺”字樣。第二部分《清代山左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下面第二個小部分開頭缺一頁，現據內容增補標題：“（二）小學方面的成就。”全稿請尼山學堂第二屆學生分工錄入電腦。原稿是簡體字，現改為繁體字，校對工作也由尼山學堂學生完成。相信這篇舊稿的發表，對山東學術史研究仍具參考價值。特此說明。（2015年6月14日杜澤遜記於校經處。）

山東古稱山左，地處黃河下游，是標誌着古代文明的齊魯之邦，我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歷史上產生過不少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科學家和文學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的建立，給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以深遠的影響。有着悠久學術傳統、以百家爭鳴為人們所艷稱的“稷下學宮”，曾經是代表不同學派的“稷下先生”的重要講臺。在經今古文學激烈鬥爭的兩漢，無論是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大都是齊魯的天下。今天我們見到的儒家經典，也是依靠孔子的整理和兩漢經師們在齊魯的講授才得以流傳。孔子還是我國第一個古籍整理工作者和校讎學的創始人。每當回憶起這段光輝的歷史，就使我們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時認識到山左的學術文化源遠流長，的確有它得天獨厚的條件。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曲折的。山左自從兩漢以後，在漫長的歲月中，雖然學者名流，代不乏人，但比起兩漢時代，則已瞠乎其後，更談不上春秋戰國了。為此曾引起顧炎武〔武〕的感嘆。他在《萊州任氏族譜序》中說：“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顧炎武提出了這個問題，但並沒有找到答案。據我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從根本上說，不外是政治的、經濟的原因。到了清代，特別是到了乾嘉時期，由於社會安定，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山左人才蔚起，學術文化出現了兩漢以後從來沒有

的繁榮局面。其中除政治、經濟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無數樸學大師的言傳身教與積極引導，以及山左學人的潔身自愛與勤奮好學，相互結合，形成了一代樸實無華的學風，流風所被，歷久不衰。這種情況，是顧炎武所沒有料到的。如果說清代山左學術是山左學術史上的昌盛時代，那麼我們不妨把它看成是兩漢學術的復興和發展。本文就是想對清代山左學術的淵源，山左學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山左學風的特點，做初步的探索，使清代山左學術的優良傳統得到繼承和發展，為繁榮山左的學術文化，做好山左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借鑒。

一、清代山左學術的淵源

清代山左學術，基本上是漢學的傳統。它的淵源，可以從遠的、近的兩個方面來加以考察。先從遠的方面來看，可以上溯到兩漢。清代山左學者崇拜的鄉賢有兩個人，一個是傳《尚書》的伏生，一個是徧注群經的鄭玄。他們兩個都是兩漢的經學大師，有功於經典的整理和流傳，受到更多尊敬的卻是鄭玄。因為鄭玄的經說，博大精深，融會今古文學，泯除門戶之見，在經學上發生很大的影響。自從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詩》用毛《傳》鄭《箋》，《周禮》《儀禮》《禮記》採用鄭注，更加鞏固了鄭學的地位。到了清代，由於顧炎武、惠棟等提倡漢學，學者都認識到兩漢經學之所以應當受到尊重，是因為它“去聖賢最近”，“在二氏未起之前”，就是說，兩漢經學還沒有受到老莊和佛家的穿鑿附會，能保持儒家經典的純潔性。一時學人，聞風景從。到了乾嘉之際，又有所發展，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已形成時代風尚。在許、鄭、賈、馬中，影響最大的，自然是鄭玄。這時的漢學，主要標榜的是鄭學，漢學和鄭學，幾乎成同義語了。山左學者，在時代風氣面前，不能不受到影響，因為鄭玄是鄉先賢，理所當然地要格外受到尊敬。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廣森，以“儀鄭”名其堂。桂馥邀請經學家丁杰和畫家羅聘（揚州八怪之一）為寫《鄭康成禮堂圖》，翁方綱為之題詠。許瀚題《漢大司農鄭公像》，甚至以鄭玄與孔子並稱，說“集羣聖大成者孔子，集羣儒之大成者鄭公”。這些山左學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以鄭玄的立身、治學作為自己的楷模，並以鄭學的傳人自擬。因此，我們說清代山左學術，淵源於兩漢，或者更加直截地說，淵源於高密，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現在需要著重加以探索的是近的淵源，也就是更加直接的淵源。只有弄清山左學術的來龍去脈，山左學者

的師承和他們的授受關係，才能對山左學術有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

談到清代山左學術淵源，離不了一代大師們對山左的影響。首先要提到的是崑山顧炎武。

顧炎武是清初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清代漢學的奠基人。就是他第一個在山左的大地上播下了漢學的種子。

顧炎武早歲與同邑友人歸莊參加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組織——復社，究心經世之學。從二十七歲起，從古代史書輯錄有關地理、形勢、山川、兵防、物產、賦稅等方面的資料，開始編撰《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清兵南下，他在蘇州參加抗清戰爭，本來準備應唐王之召，奔赴福建繼續參加抗清鬥爭，因母喪未能成行，結果被當地的漢奸豪紳，加上“通海”的罪名。為了免遭迫害，同時為了更廣泛地結納各地抗清志士，觀察華北和中原一帶的地理形勢，以謀求恢復明朝的根據地，進行深入、隱蔽的反清鬥爭，他從順治十四年（1657）四十五歲起，隻身北上，來到山東，以山東為立足點，來往於京師、河北、山西等地，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五歲，離開山東，由山西到陝西定居，先後在山東待了二十一年（1657—1677）。在這二十一年間，雖然到處奔波，但大部分時間是在山東度過的。康熙五年（1665）五十三歲，還在章丘縣大桑家村置了田舍，準備做永久之計。《刈禾長白山下》（長白山在章丘縣東）這首詩，就是在大桑家村寫的：

載未來東國，年年一往還。

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閒。

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

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詩中寫出了他親自耕耘、豐收在望的喜悅心情，同時抒發了自食其力、保全名節的深刻感受，並以黃巾城下鬻山注書的鄭康成自況。顧炎武在山東的二十一年，正是他精力旺盛、學術上豐收的二十〔一〕年。他有不少著作，如《韻補正》《音學五書》《山東考古錄》《日知錄》的大部分、《肇域志》的一部分，都是在山東完成的。他先後到過萊州、即墨、濰縣、青州、濟南、博山、長山、鄒平、濟陽、德州、泰安、長海、曲阜、鄒縣、兗州等地，嶗山、泰山、靈岩、孔林，也都有他的足跡。他對齊魯的山山水水，都有親切的感情，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篇。更為重要的是：他結交了一批推心置腹的朋友。如掖縣的趙士完、任唐臣，濟陽的張爾岐，

新城的徐夜，鄒平的馬驢，長山的劉孔懷，曲阜的顏光敏，德州的程先貞、李濤等。這些朋友，大都講求實學，崇尚名節，與顧炎武意氣相投。有的名列復社（程先貞在復社姓氏中德州名列第一），在政治上有共同語言。他每到一處，不論新交舊識，無不倒屣相迎，仰慕他的品德和學問，向他求教。用顧炎武自己的話說：“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這當然是顧炎武的自謙，事實上他的“一日之長”是當之而無愧的。在這些朋友中，有兩個人跟他的關係最深，感情最篤。一個是張爾岐，另一個是程先貞。他在《廣師》篇中，列舉了足以爲他師法的十個朋友。這十個朋友的十大長處，正是自己的短處。這十個朋友是：“學究天人、確乎不拔”的王錫闡（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的楊瑀（雪臣），“蕭然物外、自得天機”的傅山（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的李顥（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的路津濃（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的吳任臣（志伊），“文章爾雅、宅心和厚”的朱彝尊（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的王宏撰（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的張弼（力臣）。另外一個就是張爾岐。他說：“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他不止一次地推重張爾岐。在爲張爾岐的《儀禮鄭注句讀》作序時，稱讚他“篤志好學，不應科名”，說他這本書“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肯定“後之君子”，定能“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製作之原”。在《答汪苕文書》中，又說：“《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康熙十四年（1675），他到濟陽訪張爾岐，寫了《過張貢士爾岐》詩：

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
濟水夏寒清見底，石田春潤晚生苗。
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
竊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

這首詩充分反映顧炎武對張氏的尊敬和同情。最後兩句，他用後漢潁川荀淑和黃憲（叔度）的故事，說明他是聽講而來，雖然路途遙遠，也在所不辭。在《亭林文集》中有一篇反映顧炎武精神面貌、爲人們所傳誦的《與友人論學書》，這個友人就是張爾岐。就在這篇《論學書》中，顧炎武第

一次提出了做人、治學的兩大目標：一是“博學於文”，二是“行己有恥”。他把“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都看成是學問的事；把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都看成是有耻的事。特別強調“耻”字的重要。他認為這就是“所謂聖人之道”，“孔子、孟子之所恒言”。他對晚明以來“舍多學而識”而“空言性命”，“置四海困窮於不顧”而講“危微精一”的空疏學風，加以猛烈的抨擊。這在當時是“對於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是“思想界的一大解放”，跟他提出的“經學即理學”的主張是一致的。這對原來講求宋明理學的張爾岐來說，要在一夜之間，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有困難的。張在《答顧亭林書》中，承認“《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的，確當不易，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但同時他對性命之理，又向顧炎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這種看法，雖然跟顧炎武存在一定的距離，但他畢竟已經認識到宋明理學“好高無實”之病，比起那些固守殘壘的理學家們已前進了一大步。這不能不是顧炎武的影響。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把張爾岐和閻若璩、胡渭同樣看成是清代漢學的先驅（《師承記》在第一卷中先列閻若璩，次列胡渭、張爾岐、馬驥），是很有道理的。

再說程先貞。程先貞在明末當過工部員外郎，明亡後家居二十餘年，不求聞達，志行高潔。自從與顧炎武定交，顧每過德州，總要到程家作客，有時住一兩天，有時住十天八天才走。每次來到，與程先貞“讀說經史，不憚娓娓”。程先貞也盡窺其著述之富。康熙九年（1670），顧炎武應程先貞和李濤（紫瀾）的邀請，在德州爲他們講《易》，從六月講到九月初才完畢。顧炎武爲此寫了《在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這首詩，以“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來激勵朋友們珍重晚節。就在這次講《易》時，程先貞寫了《贈顧亭林先生序》，對顧欽佩得五體投地。讀了顧的《日知錄》，“爲之三嘆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在他看來，《日知錄》只是亭林的“支峰蔓壑”，若“必欲東觀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那就必須閱讀亭林的全書。假如他“疾而不死”，準備用十年時間，“讀書養氣”，“文思少進”，才有可能細論亭林的全部著作。令人遺憾的是：程先貞的願望未能實現，過了兩年（1673）他就病故了。顧炎武懷着沉痛的心情，親自到德州

送葬。《送程工部葬》詩，仍然殷切地關懷着山左的風教。

顧炎武在與山左學者的交往中，還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李濤，一個是顏光敏。康熙六年（1667）顧炎武到德州，就主程先貞和李濤家。李濤字紫瀾，號述齋，康熙十五年翰林，官至刑部侍郎。顧、李定交，大概出於程先貞的介紹。因為定交在前，所以康熙九年（1670）六月，程、李兩家延請顧炎武在德州講《易》。後來李濤晉京入仕，仍然跟顧炎武書函往還。直到顧到關中定居，還是一再寫信存問。從顧《答李紫瀾書》中可以看到，顧曾向李提出“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的主張，得到李的稱許，顧也盛讚李“不負平生所學”。就在這通書札中，顧炎武深慨“城郭溝池以為固，甲兵以為防，米粟芻茭以為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言外之音，對明代大好河山，拱手讓人，深感痛心。這種真心話，可以向李濤傾吐，證明他們不是泛泛之交。

顧炎武於康熙四年（1665）與顏光敏訂交，以後也成為知己。顏光敏，字修來，一字遜甫，康熙六年（1667）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樂圃集》。顧炎武稱其詩“清新婉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又說“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為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顧炎武向不輕許別人的詩文，他對顏詩的評價，決非阿其所好。張穆《顧亭林年譜》輯錄顧炎武《與顏修來書》十四通（已輯入《顧亭林詩文集》，中華1959版），從中可以看到顧、顏之間頻繁的交往，以及顧炎武對黃培詩獄一案被誣的肺腑之言。他們在學術上的相互切磋，也是成為知交的原因之一。顧炎武以《詩本音》初稿，就正於顏光敏，顏為之逐錄副本。可見他真心誠意地服膺顧氏之學。後來顧氏刻印了《韻補正》《日知錄》八卷本，鐫刻了《座右語》和《音學五書》的面葉，都檢送給顏光敏。顧還給顏校勘過《家訓》。與黃培詩案有牽連的謝長吉霸占大桑家村田地案的順利結案，謝長吉受到法律制裁，顏光敏等起到一定的作用。

顧炎武與德州人士的交往，除程先貞、李濤外，見於記載的還有謝重輝、張簡可。重輝字方山，以父陞蔭，官至刑部郎中。顧炎武稱他“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康熙八年（1669）夏秋間，顧曾主於其家（是年十一月，謝重輝以蔭職入都，顧致書顏光敏，請其照拂。

這當然是在德州“主於其家”。張穆《顧亭林年譜》作康熙八年十一月，至都，主謝方山重輝，疑誤。）康熙十八年（1679），顧的弟子潘耒（次耕）應試鴻博，就是由左諭德盧琦和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的。謝重輝是詩人。商邱宋犖（牧仲）、合肥李天馥（湘北）在《田山薑集》中，均有與謝重輝酬倡之作。趙執信《談龍錄》，舉當朝詩人，山左有九，皆各有所就，了無扶持依傍，而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居其一。王士禛為謝的《杏村集》作序，亦推獎不遺餘力。顧炎武“主於其家”，而且“昕夕對談”，推重備至，這不是偶然的。

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顧炎武從北京到了德州，取道鄭家口至曲周，準備到關中定居。此時他的撫子衍生和衍生之師李雲霖（既足），附沈度汪家眷先顧炎武到德州，準備入都。顧炎武事先留信在張簡可家，讓他們在張家等候。這是顧炎武和衍生第一次見面，他們的“父子禮”，就在張家行的。可見張簡……（整理者按：此處未完）

顧炎武在山左期間，先後校訂過馬驢的《鄒平縣志》和程先貞的《德州志》。康熙十二年（1673），曾應山東布政使施天喬的邀請，在山東通志局對《通志》中的山川、古迹，作了刪訂。還在通志局完成了他自己的《山東輦域記》（《輦域志》的一部分）。當時參加志局的有張爾岐和淄川的薛鳳祚（儀甫）、樂安的李煥章（象先）。據李煥章回憶，他和顧炎武、張爾岐、薛鳳祚“每花明月大，耳熱酒酣，白髮氍毹，婆娑相向者三年所，友朋聚晤之樂，未有若斯之久者”。他們三個人，在學術上都各有所長，跟顧炎武早夕與共，“耳熱酒酣”之餘，少不了上下議論。從康熙十七年（1678）起，顧炎武離開山東到關中定居，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3）逝世為止，他雖然沒有再來山東，然而他在山左的流風餘韻，一直綿延了三百多年。清代山左學術的得以蓬勃發展，跟他的倡導是分不開的。人所共知，顧炎武是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山左是他的第二故鄉，理所當然的他是山左學術的奠基人。

清代漢學以考證學為核心，雖然顧炎武開一代風氣之先，但當時不過粗引端緒，而且也還沒有占領全部學術陣地。真正形成考證學的風氣，是從乾嘉時代開始的。山左也并不例外。乾嘉時代的漢學，以元和惠棟（定宇）、休寧戴震（東原）為代表，形成吳、皖兩大學派，一時學人都爭相攀附，有的成了他們的入室弟子；有的執經問難，介於師友之間。有的不

一定受過他們的親炙，因為治學方法和個人愛好近似，也就成為私淑弟子或學術傳人。我們從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基本上可以看到清代漢學的傳授源流。據我所知，無論惠棟和戴震本人，還是他們的弟子和再傳弟子，都與山左學術有着深厚的淵源。

最早跟惠棟、戴震交往的是德州盧見曾。盧見曾，字抱孫，號澹園，嘗自稱雅雨山人。他的曾叔祖盧世淮（德水），素負文名，是山左著名的抄書家。盧見曾早年親炙於王士禛、田雯之門，故以詩名家。其實他不只是詩人，還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校勘學家。張之洞《書目問答》列入校勘學家的，山左有三人，其一就是盧見曾（另外二人是李文藻和周永年）。盧在兩淮鹽運使任內，以愛才好客著稱，四方名士畢集維揚，談藝者無不知有雅雨先生。平生“最篤師友之誼”，如虞山汪應銓（容齋）、桐城馬樸臣（相如）、懷寧李薊（嘯村）、全椒郭肇鑽（韻法）等人的遺集，都是盧見曾為他們序而梓行。尤其重要的是：他校刊過《金石三例》十五卷（包括元潘昂霄《金石例》十卷，明王行《墓銘舉例》四卷，清黃宗羲《金石要例》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金石錄》有兩個宋刊本，一是開禧元年趙不譴刊本，一是淳熙龍舒郡齋刊本。因為這兩個宋本長期沉寢不顯，元明以來惟有鈔本流傳。盧見曾鑒於一代名著和鄉邦文獻，輾轉傳抄，頗多舛誤，曾覓得何焯（義門）鈔校本，又得影鈔順治七年濟南謝世箕刊本，經過校勘，加以刻印，使《金石錄》得以廣泛流通，成為《四部叢刊》影印呂無黨鈔本前一百八十多年中刊刻最早最好的一個版本。因為他提倡經學，兩淮鹽運使署又是“揚州詩局”所在地，良工佳匠，冠於東南，先後校刊了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方世舉的《編年昌黎詩注》十二卷，《雅雨堂藏書》十三種一百三十八卷。這都是大部頭書，費時耗費，不是有魄力的人是辦不到的。當時負責校勘工作的正是惠棟。惠棟晚年大部分時間是在鹽運使署度過的。盧見曾校刊的《漁洋感舊集》十六卷（附盧撰《感舊集小傳》四卷），自己編選的《山左詩鈔》三十卷，都經惠棟手訂。盧見曾除在《雅雨堂藏書》內收入惠棟補輯的《鄭氏周易》三卷和惠棟撰《周易爻辰圖》一卷外，還單刻了惠棟的《周易述》十九卷，《易微言》二卷，成為惠派學術的最早傳播者。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盧、惠之間，不僅有着親密的感情，在學術觀點上，彼此也是同心相印，同氣相求的。如果說盧見曾是惠學的傳人之一，也並不為過。盧見曾為什麼特別重視惠棟的《易》學著作呢？這是因為清代樸學的門戶壁壘，實際是由惠棟開始

建立的。惠氏之學，以“博學好古爲宗旨，凡漢儒舊說（包括陰陽五行），都認爲可寶”。他的最大成就，在於追考漢儒《易》學，發明《易》的本例，撰《易漢學》《周易述》《易微言》《易例》諸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周易述》。《四庫全書總目》說“其書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寔遠。……棟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這是對惠棟學說的最好說明，也是盧見曾崇尚惠學的原因所在。

盧見曾既結交了惠棟，又結交了戴震、盧文弨和王昶。戴震第一次見到惠棟，就是在盧見曾那里。時間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是惠棟去世前一年。這次兩位大師的會見，應該是一次盛會。揚州兩淮鹽運使署成爲事實上東南學術交流中心。盧見曾結交盧文弨（召弓，餘姚人）的時間，早於戴震。大約在校刊《雅雨堂藏書》中的《大戴禮記》時，盧見曾知道他校過《大戴禮記》，向他索取校本，盧文弨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揚州兩淮鹽運使署，第一次與盧見曾見面。因爲盧見曾和盧文弨的父親盧存心“篤兄弟之好”，素“以文章行誼相契合”，所以盧文弨以父執之禮待盧見曾，盧見曾對他“獎惜備至”，優禮有加。雅雨堂刊本《大戴禮記》就以盧文弨所藏元刊本作底本，又經盧文弨的精心校勘，盧文弨認爲“無大謬誤”，然后付諸剞劂。由於校刊《大戴禮記》用了兩年時間，盧文弨不可能久客揚州，在校刊的過程中，遇有疑義，盧見曾經常給盧文弨寫信，和他反復商討。可見盧見曾爲了校刊這部書，是耗費了不少心血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來到揚州，這時《大戴禮記》已經刊成。盧見曾了解戴震也曾校勘過《大戴禮記》，所以又請他復校。復校的結果，戴震發現“印校俗字太多”，“所有誤字，向未覈出”。他用自己的五個舊本與盧文弨校本對勘，發現盧文弨校本所失者，在他的五個舊本中都可以得到改正。他在兩淮鹽運使署呆了將近四年（從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二十三年曾參加北關鄉試），除在那里寫了《金山志》《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後語二》外，曾先後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十六年（1761）兩次給盧文弨寫信，臚舉應改之字。盧文弨自己復校，同樣發現了一些錯誤。現在我們見到的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凡是乾隆二十五年戴震信上談到的那些字，都已改正。這是在戴震親自主持下就原版挖改的。乾隆二十六年，戴震已離開揚

州，所以第二次信內所舉之字未及改正。後來戴震進了四庫館，又在雅雨堂本的基礎上，從《永樂大典》和其他古籍中所見《大戴禮記》引文，參互考訂，整理成四庫定本。關於盧文弨為盧見曾校勘《大戴禮記》的經過，盧文弨在《新刻大戴禮記跋》中有過詳細的記述：

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經術迪後進，於漢唐諸儒說經之書，既遴得若干種，付剞劂氏以行世，猶以《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譌舛，馴至不可讀，欲加是正，以傳諸學者。知文弨與休寧戴君震夙嘗留意是書，因索其本，并集眾家本，參伍以求其是，義有疑者常手疏下問，往復再四而後定，凡二年始竣事，蓋其慎也如此。……戴君丁丑所見余本，即元時本耳。自後余凡六、七讐校，始得自信無大謬誤。刻成覆閱，又得數事，今附見於後。以此益知學問之道無窮，心思之用亦無窮，庶幾來者亦將有所得乎此也。

以上事實表明，戴震和盧文弨在校勘學上都曾與盧見曾有過親密的合作，盧見曾在校勘學上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績，這跟他的虛懷若谷，以及惠棟、戴震、盧文弨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王昶（述庵、蘭泉，青浦人）也是乾嘉的著名學者，湛深經學，精於考證，曾收羅商周銅器及宋、遼、金石刻拓片一千五百餘種，以五十年的精力編為《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他還是乾嘉時精通佛典的四大家之一（另外三人是桐城姚範、歷城周永年、錢塘張世瑩）。乾隆二十年（1755）游山左，南歸后盧見曾聘他為兒孫課館，在兩淮鹽運使署待了三年。當時王昶與詩人程午橋、馬曰琯、馬曰璐、汪棣、張四科等為文酒之會，一時傳為佳話。乾隆二十二年（1757）弘曆南巡，駐蹕揚州，王昶就在這個時候因為獻賦受到弘曆的賞識，授予內閣中書的官職。王昶在揚州期間，除參訂《山左詩鈔》外，還應盧見曾之囑，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這短短的三年，無論對盧見曾，還是對王昶來說，都是終身難忘的。

另一位山左學者與戴震交往的是曲阜孔繼涵（荭谷）。孔繼涵和他的兄子廣森（塤軒）、歷城周永年（書昌），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同科進士。戴震於乾隆三十八年和周永年、邵晉涵、余集、楊昌霖同時被征為《四庫全書》纂修官，號稱“五征君”。因為他們都是漢學名家，突然得到這樣高的“榮譽”，京師的學風為之狂變，“四方才略之士”，“投簡於公卿